

载《未来10-15年我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我国周边贸易投资结构与竞争关系

周小兵

20世纪90年代，东亚^[1]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陷入了长达10年的低增长期；“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在一阵令人眩目的持续高增长后几乎同时陷入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则保持了持续不断的高增长并且成功地避开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漩涡。在这一连串的区域经济结构变化中，东亚的贸易和投资结构相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同期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将会对今后10-15年东亚地区的经济格局产生影响。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其经济发展将对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在努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构筑东亚新的贸易投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

一、9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

(一) 90年代东亚贸易的发展概况

1. 东亚对外贸易保持增长，但后半期速度急剧下降

东亚对外商品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1980-1990年）年均增长9.3%，90年代（1990-2000年）为8.8%。虽然增长速度大体相近，但90年代的发展趋势恰与80年代先低后高的发展轨迹相反，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基本态势。90年代东亚贸易增长速度下降始于1996年，随后即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在危机中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发展速度和对外贸易大幅度下降。

2. 外贸下降的主因是出口收入减少

东亚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致，影响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商品出口。在发展过程中，东亚形成了出口竞争力很强的加工制造业，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贸易高增长阶段，东亚的出口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在1996以后，以时值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却断续出现了三次负增长，且衰退程度越来越深。尽管一些东亚经济体以本币计算的出口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下降，但这一时期汇率变动程度很大，特别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以贬值为主的剧烈波动，东亚金融危机中大部分东亚货币也出现大幅度贬值，导致东亚整体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收入下降。这样，尽管东亚出口曾有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但长期的平均水平仍被近几年的下降拉低，80年代东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90年代降为9%；与之相对比的是，两个时期进口年均增长率都是8.5%。

(二) 90年代东亚外贸结构变化趋势

1. 东亚区内贸易已占重要地位

90年代以前的较长时期里，东亚对外贸易中的对区内贸易低于35%。80年代后期东亚区内贸易开始加快增长速度，1990年区内贸易已上升到对外贸易的41.6%，到1996年时达到外贸总额的一半。这样，如果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其区内出口总额在当时世界大的区域贸易集团中已居第二位。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区内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区内出口在东亚总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42.1%。尽管其后的恢复进程中波动幅度很大，但是东亚区内贸易的比重仍出现明显的恢复，2001年区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46.7%。同时，由于从区外进口大幅度压缩，使区内进口相对上升，占到了总进口的52.5%，这样就使区内贸易总额在东亚外贸中的比重达到49.5%。

2. 以中国为中心的次区域贸易圈迅速扩大

东亚内贸易由三个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次区域贸易圈组成。就其规模看，90年代以前一直是以日本和韩国组成的贸易圈为首，并且由于中国的台湾省与中国大陆之间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台湾对东亚贸易一直是与日韩保持密切关系，对中国大陆的交易量很小。90年代以后台湾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迅速增长，其区内贸易关系因而逐步转向大陆地区，加上中国本身经济迅速增长，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量相应扩大；而东亚区内贸易的最大成员日本在这一阶段经济持续低增长，使其对周边的贸易增长较慢，相应在区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这两方面的变化使中国对东亚区内贸易规模越来越接近日本对东亚的贸易量，中国大陆地区、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之间的贸易在东亚区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区内贸易中最大的次区域贸易圈。到2001年，中港台贸易圈在东亚区内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已达到44.1%，其中在区内出口中占41.1%；在区内进口中占47.1%。

表 东亚区内贸易中各贸易圈的规模变化

占区内进口	中港台	中国	日韩	日本	东盟
1971	29.89	5.43	37.08	26.78	33.02
1981	30.07	7.11	38.73	30.75	31.20
1991	41.27	10.59	29.76	20.13	28.96
1996	41.98	11.83	27.65	19.08	30.37
2001	47.12	17.54	28.22	19.72	24.66
占区内出口	中港台	中国	日韩	日本	东盟
1971	20.27	9.93	49.95	46.91	29.78
1981	24.24	11.95	41.10	35.32	34.66
1991	37.19	14.75	38.21	30.21	24.60
1996	36.38	12.91	35.79	27.07	27.83
2001	41.08	17.81	31.41	22.23	27.51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数据计算。

3. 区内贸易流向继续保持明显的单向流动

东亚的区内贸易结构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均衡，在近30年中基本上是小额赤字，大致保持在占区内贸易总额1%的范围内。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地区内的进口大幅度下降，导致区内贸易赤字逐步增长，从1998年的43.5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11亿美元。但即使如此，区内贸易赤字也仅占区内贸易总额的0.4%。

不过，从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看，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则处于相当明显的非均衡状态，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在区内贸易占主导地位。

主要的商品流向是日本向东亚其他经济体输出资本密集品；“亚洲四小龙”一方面输入日本的资本密集品，一方面也向中国和东盟输出资本密集品；中国和东盟则主要是向上述经济体输出自然资源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

由于大约三分之二的区域内贸易是资本密集产品，因而区内贸易的基本流向就是以日本向“四小”、再向中国和东盟输出资本密集产品这样的基本途径为主线。从区内资本品进口市场大的分布结构看，中港台和东盟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占地区总进口的38%，而日韩从前两者的进口仅占13.7%，中港台和东盟之间相互的资本品进口也是13.7%（1999年）。这样，区内资本品贸易的主要部分的流向显然是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流动，反向的流动与其有很大的差距。

东亚区内的资源产品（农矿产品）贸易流向与资本品相反，日韩是主要进口方，接近地

区资源产品进口总额的40%；东盟是主要出口方，中国是其次的出口方。不过，由于区内贸易中资源产品的规模远小于资本品，因而资源产品与资本品的流向虽然相反，但两者并不能平衡。

东亚劳动密集产品的贸易流向近似于资源产品贸易，如果排除香港从中国进口再转口到区外市场的部分，日韩就是区内劳动密集产品的主要进口方，中国是主要出口方，其他方向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总的来看，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生产对从东亚本地区进口的资本品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它们的区内贸易有较强的进口刚性，近期的表现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从区外的进口下降幅度很大，而从区内的进口降幅相对要小。这种结构性的进口依赖就导致以资本密集产品为主的单向商品贸易流动在区内贸易占主导地位。

4. 区内贸易流程增加了新的环节，区内贸易逆差方从“四小”向中国转移

区内贸易的单向流动造成了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是不均衡的，或是持续顺差，或是持续逆差。逆差主要通过对区外市场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自90年代以来，虽然这种格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格局中的部分环节已开始出现了较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日本，它的区内贸易一直是大额顺差，1995年达到706亿美元，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01年只有154亿美元。日本的顺差来源主要是“四小龙”，1995年它对后者的顺差达到695亿美元。

其次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这两个经济体在90年代以前对区内贸易一直是逆差，这些逆差在区内无法全部解决，主要靠对美国等区外市场的顺差来平衡。而在80年代末以后，则先后转为顺差，转变的时间恰恰与它们恢复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同步。到2001年，韩国区内贸易顺差为39亿美元，台湾省顺差为74亿美元。

第三是中国，对区内贸易从1997年的顺差197亿美元转变成为2000年的逆差3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保持着顺差。顺差主要来源是对香港贸易，实际上是通过香港的转口获得，这部分顺差数额足以平衡中国对东亚区内贸易的大量逆差。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东亚的出口下降，使中国对区内贸易的长期顺差迅速下降，并不时出现逆差。

另外，新加坡在2001年的区内贸易也出现了数十年没有过的顺差。

这些变化表明，东亚区内贸易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日本大量顺差，而“亚洲四小龙”区内逆差、并向区外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出口获得顺差以平衡区内逆差的所谓日本、“四小”、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或结构正在嵌入新的环节，即中国的加入，使区内贸易基本格局变为日本、“四小”分享区内贸易顺差，中国区内顺差大幅下降或趋向逆差，并对美获得越来越大的顺差。前述的“三角关系”变为四连环的关系。

5. 东亚对区外市场仍保持结构性的依赖关系

首先，东亚从对区外贸易中获得大量顺差。东亚对区外贸易从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顺差，进入90年代以后顺差逐步下降，这主要是随着东亚经济增长，从东亚外的进口相应迅速增长，使对区外贸易的收支状况出现走向平衡的可能，到1996年东亚对区外贸易的顺差为343亿美元，是1983年以来最低的。但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东亚许多国家或地区受到沉重打击，经济严重衰退使消费能力下降，同时政府也都采取紧缩型危机对策，这就导致了从区外的进口相应被大幅度压缩；相比之下，同期对区外出口作为摆脱危机的重要途径而保持了增长，因此到1998年东亚对区外贸易顺差达到234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与其后的三年累计，1998-2001年东亚对区外贸易顺差达到8458亿美元。

表 9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收支状况 单位：10亿美元

	贸易收支总额	区内贸易收支	区外贸易收支
1991	72.0	-6.2	78.2
1992	99.2	-7.1	106.4
1993	96.2	-17.0	113.2
1994	104.4	-2.9	107.3

1995	80.7	3.2	77.5
1996	33.6	-0.7	34.3
1997	89.2	13.6	75.5
1998	229.8	-4.4	234.2
1999	225.0	-7.5	232.5
2000	203.0	-10.0	213.0
2001	155.1	-11.1	166.2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数据计算。

其次，东亚区内贸易的平衡也严重依赖区外市场。如前所述，与东亚对区外贸易的大量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区内贸易在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略有逆差的基本平衡状态，金融危机和之后的经济恢复都没有改变这一结构。但从个体角度看，各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存在较大的顺差或逆差。也就是说，东亚的区内贸易结构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东亚内贸易流向中，日本一直是最大的顺差国；“四小龙”是最大的逆差经济群，它们的逆差主要由对美贸易顺差平衡，也就是靠区外平衡。在90年代，“四小龙”中的台湾省和韩国的区内贸易收支从长期的逆差转为顺差，而中国的区内贸易顺差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逐步下降并出现逆差，日本则是顺差大幅度下降。这样，中国正在吸收“四小龙”的区内贸易逆差，而由此产生的对区内顺差的减少大部要由对美贸易的顺差增量平衡。

6. 东亚对美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开始下降

东亚与美国之间贸易的双向相对下降是90年代东亚对外贸易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变化。尽管东亚对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严重，但从90年代以后，美国在东亚对区外贸易中份额的增长已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倾向，而且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东亚的份额在9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下降。

美国市场是东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特别是在一些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东亚经济体，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是严重。因此经过长期积累，美国市场在东亚对区外出口中的份额便逐步上升，在1986年达到51%的历史最高点。此时东亚的日本、“四小龙”等已基本越过起飞阶段，越来越强的出口能力迫使美国市场对它们逐步增强了限制，结果使美国市场在东亚区外出口中的份额开始相对下降，1991年降到42%。此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出口迅速增长，使美国市场在东亚区外出口中的份额有所回升。在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保住或增加对美出口成为东亚一些经济体摆脱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美国市场在东亚区外出口中的份额在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45%。另一方面，东亚对区外出口的长期增量也显示出美国市场的相对下降，1980-1990年对美贸易顺差增长1238亿美元，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增量为1348亿美元，两者相差约110亿美元；而1991-2001年东亚对美贸易顺差为1714亿美元，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顺差增量为2332亿美元，两者相差618亿美元。

对美出口是东亚与美国贸易关系中相对稳定的一面，而美国在东亚区外进口中的地位则没有这样稳定。在爆发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幅度压缩进口，从美国的进口相应受到挤压，使美国在东亚自区外进口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从1995年的34.4%逐步降到2001年的29.6%，这是自1985年以来第一次降到30%以下。

更明显的下降在美国的对外贸易方面。1995年东亚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为35.8%，这是历史最高值，此后东亚的份额便持续下降，到2001年已降到29.9%。在美国的出口中，东亚的份额从1995年的30.1%降到2001年的23.9%；在美国的进口中，东亚的份额从1993年后开始下降，当时为40.3%，而到2001年已降到33.6%。

表 90年代以来东亚与美国贸易关系的变化 %

	美国在东亚 区外出口中的份额	美国在东亚 区外进口中的份额	东亚在美国 出口中的份额	东亚在美国 进口中的份额
1991	41.98	33.74	26.73	39.04
1992	41.85	33.66	26.36	39.65
1993	44.00	33.73	27.58	40.29

1994	45.39	34.11	27.77	40.19
1995	43.69	34.42	30.13	39.75
1996	43.60	34.30	29.32	37.42
1997	42.96	34.08	27.58	36.95
1998	42.32	36.00	23.78	36.64
1999	44.54	34.99	24.25	36.14
2000	45.68	31.46	25.02	35.23
2001	44.04	29.58	23.87	33.64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数据计算。

（三）东亚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

综上所述，9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结构实际上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东亚区内贸易逐步上升，已占东亚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第二个转变是东亚区内贸易的链条上增加了中国这一新的环节；第三个转变是东亚与美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出现下降的可能。从这三大转变的关系看，实际上是后两个转变决定了第一个转变。也就是说，在东亚内部，新增加的中国环节是区内贸易增量的主要部分；在东亚外部，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密切程度下降使东亚对区外贸易的增长有所停滞，区内贸易部分相应上升。

东亚区内贸易增长、对美贸易关系的依赖程度出现下降，是东亚对外贸易关系的重要转折，尽管其中有金融危机因素造成的影响，但这一基本趋势已比较明显。导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促成了东亚贸易链条增加了新的环节。
2. 东盟（4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与波动、市场的分割使其无力接续东亚贸易链。90年代前半期，东盟开始接续贸易链，它对东亚区内贸易为上升的赤字；金融危机后，东盟的这一能力消失，区内贸易赤字下降。
3. 日本对东亚贸易顺差下降，特别是对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从长期的顺差转为2001年50亿美元的逆差（日方统计），这主要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自8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增长，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速度加快，而日本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增速却提高较慢。表明日本的产业升级或产业转移模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向“四小”和东盟转移时并没有出让国内市场，只是将生产地点转移，转移产业的市场指向仍以美国市场为主。现在向中国转移（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四小龙”）已向中国让出部分市场。

二、90年代以来东亚投资结构的变化

东亚区域内投资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地区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投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地区经济力量结构的变化，并导致地区经贸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在这里，主要分析地区内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涉及其他主要投资形式的分析。

（一）90年代东亚直接投资的主要变化

1. 90年代东亚从直接投资净流出地区转为净流入区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日本大量向外输出直接投资，其总量远超过东亚流入的直接投资，因而整个东亚地区成为直接投资输出区。1990年日本对外净输出直接投资487亿美元，同期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开始对外净输出直接投资，当年输出43亿美元，而其它东亚经济体净输入直接投资仅为137亿美元，因此整个地区平衡后，净输出直接投资约393亿美元。这一状况在中国扩大引进外资、日本经济进入长达10之久的停滞状态后开始转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从1991年开始逐步减少，1993年只有138亿美元。而中国引入外资不断增长，从1990年的35亿美元跃升到1994年的338亿美元。中日直接投资的反向发展使整个东亚地区迅速转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入地区。此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2. “四小龙”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东亚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与中转

“四小龙”在80年代后期开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并在90年代前半期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在1993年达238亿美元，首次超过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138亿美元的水平；1997年“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更达到436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261亿美元）^[2]。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下降，到2001年为271亿美元，再次低于日本（385亿美元）。日本虽然是东亚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但它的投资方向主要在美欧等工业发达地区，因此“四小龙”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地区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和作用就相应更大了。不过，“四小龙”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一方面从其他地区引入外资，一方面向周边地区输出直接投资；而韩国和台湾省则主要是向外输出自己的资本，因此从直接投资的净流量看，香港和新加坡是直接投资流入大于流出，韩国和台湾省则相反。特别是香港，它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向是中国内地，香港在东亚直接投资流向中的作用主要是投资的集散地，它引进其他地区的投资，然后向中国内地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输出投资。应当指出的是，香港的这一作用是在90年代中国扩大引进外资后才逐步显现的，香港在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与中国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

3. 中国上升成为东亚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地区

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迅速增长，使其在东亚流入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从80年代后半期的20%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40%强。从数额看，“四小龙”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要稍多于中国，但其中香港引入外资中有很大部分转而流入中国，因而实际上“四小龙”引入外资量小于中国。从下表可明显看出，东盟4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使其在东亚的份额从80年代后期的20%左右下降到90年代后期的6%。

表 90年代东亚流入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日本	中国	香港	东盟4国	NIEs3	合计
1986-1989	-120	10776	10975	10628	17357	49616
各经济体份额%	-0.24	21.72	22.12	21.42	34.98	100
1990-1997	11790	240841	155688	85325	76392	570036
各经济体份额%	2.07	42.25	27.31	14.97	13.40	100
1998-2001	30000	165144	124101	26078	71619	416942
各经济体份额%	7.20	39.61	29.76	6.25	17.18	100

注：2000年香港外资包括一项240亿美元的电信并购项目。NIEs3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台湾金融统计（IMF格式）、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

4. 东亚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经过上述变化，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在90年代形成了新的基本格局。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省成为地区内的直接投资净输出地区，香港和新加坡使地区内直接投资的重要中转地区，中国和东盟四国成为地区内直接投资的净输入地区。其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规模要远远大于韩国和台湾省，但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在其总投资额中的比重并不高，因此这一时期“四小龙”在区内直接投资流动中的作用并不低于日本。中国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已取代了东盟在地区内主要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地位，成为东亚地区引入直接投资最大的地区。

（二）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1. 东亚地区内的产业转移使“四小龙”输出直接投资

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发展较早的经济体在90年代都已先后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阶段，这是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主要内在原因，而这种结构性转变导致了地区性的产业转移，并引发了区内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流动。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工业化的进程中，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将出现相对下降，而服务业相对上升，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2100美元（1970年价格）左右。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因此在服务业占经济很大比重的后工业化经济中，经济增长率要低于制造业上升期。

对东亚地区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数据分析表明，它们的发展与钱纳里等人的结论十分接近。日本在7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香港在8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在90年代初期分别达到了上述制造业相对下降的人均GDP拐点水平，此后它们的制造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以香港和台湾省制造业的相对下降最为明显。在这些经济体达到拐点期的前后，投资率也达到了最高点，随后便出现了投资率明显的下降。显然，人均GDP的上升将提高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可以推断拐点后发生的制造业相对下降是与收入上升相关的，也就是说成本因素是导致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

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东亚地区经济中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发生了区域内的产业转移，转移的基本目标是将生产过程转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周边地区，而这种产业转移的载体就是直接投资。并且从实际情况看，日本和“四小龙”都出现了投资率的下降，因此它们本身吸引外资的余地是有限的，大量资本不得不流向外部。这样，“四小龙”在90年代就与日本共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直接投资来源。

2. 地区经济实力的变化使日本对外投资下降

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是影响对外投资能力变化的重要因素。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其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不断下降，从80年中期占地区GDP总额75%的最高水平下降到90年代末的60%左右。从地区经济增量看，日本地位的相对下降更为明显。在90年代前半期（1991~1995年），东亚经济增量（以时值美元计算的当年新增加的GDP）中69%来自日本，14%来自“四小龙”，10%来自中国，7%来自东盟4国。实际上，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停滞，5年中年均增长率只有1.4%，因而以时值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增量主要来自日元在同期约48%的大幅度升值。随后日元在3年（1996~1998年）中贬值31%，导致东亚经济增量呈现负数。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4年复苏过程中，日本经济实际年均增长仅0.6%，在同期东亚经济增量中只占10%，而中国占44%，“四小龙”占26%，东盟4国占20%。

从上述情况看，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已失去在实际经济增长中带动东亚高速增长的能力，这一时期它对东亚经济的重要影响更多地在于其汇率大幅波动造成的不稳定。

而90年代前半期“四小龙”的经济还能够基本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这就使它们在东亚区域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扩大投资的能力相应也有所提高。

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外投资相应下降，“四小龙”则相应上升。从实际数据上看，“四小龙”在9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甚至超过了日本，1990至1999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503亿美元，“四小龙”则达到了2644亿美元。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四小龙”整体经济实力仍然远低于日本，因此其对外投资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实际上是远逊于日本的。因为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大部分是源于香港，而其中一部分是香港引进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而转投中国大陆地区的。

3. 地区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对亚太的经济战略服从于安全和政治战略，因而美国可以大量进口东亚产品，以对东亚的大量贸易逆差换取东亚对美全球战略的支持。80年代中期，前苏联

开始走下坡路，对苏的战略利益开始下降，而东亚迅速发展的前景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明显上升。美国相应逐步调整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其中对东亚经济影响最大的是迫使日本和“四小龙”采取措施减轻其对美市场的顺差压力。美国的主要手段是压日元升值、取消给予“四小龙”的部分贸易优惠待遇，即宣布“四小龙”从发展中经济毕业。这实际上是迫使它们的出口产品相应提高了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了它们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美国的战略调整使日本和“四小龙”对美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不得不大量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同时日本也因货币大幅度升值而突然扩大了对外投资能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和“四小龙”先后进入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

4. 东盟与中国增长的换位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能力

80年代后期东盟经济迅速增长，到90年代初一度曾超过“四小龙”，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东盟在这一时期的高增长为其引进外资提供了较好的支持，使东盟引进外资持续超过中国，与中国引进外资的差距迅速从两倍扩大到三倍，到1991年东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129亿美元，同期中国引进外资为43亿美元。1992年中国开始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此后经济增长率不仅超过东盟，而且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也迅速涌入，从1993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期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816亿美元，而东盟为1030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7%以上的持续增长，东盟经济则一蹶不振。与之相应，双方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差距也急剧扩大，1998-2001年中国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651亿美元，同期东盟引进额仅为583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其巨大的市场规模潜力呈现在世人面前，规模因素正逐步成为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盟虽然在扩大后有5亿人口，人均GDP超过中国，而且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也比较快，但即便如此，东盟的市场分割状况仍比中国严重，特别是东盟内部劳动力的流动仍受很大限制，使其要素不能真正在其内部自由流动。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也有相当大的地方保护主义，但要素流动程度要比东盟强很多，因而中国市场规模要比东盟更完整、现实。而且从跨国公司方面看，根据自50年代到90年代的多项关于影响投资决策的调查表明，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特征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这些特征包括政治经济形势、关税和贸易壁垒、运输成本、法律环境、市场规模与潜力等等，而投资鼓励措施的影响很小[3]。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加入WTO后，上述市场特征逐步改善的前景十分良好，东盟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市场特征与中国相比的优势不明显。

三、未来10-15年我国周边地区投资贸易结构的发展趋势

（一）未来10-15年影响地区投资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今后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周边地区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地区内因素主要在两大方面，一个是区域内各经济内部产业结构的继续调整，另一个是通过经济不断增长、区域内各经济体间制度环境的建立与完善使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从两者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程度看，区域市场规模扩展与市场环境建设将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区外因素主要是外部市场对东亚地区产品的承受力限制，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1. 产业结构继续调整

我国周边地区部分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它们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在逐步相对下降，部分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产业已外移到其他地区生产，这是一般的产业转移过程。实际上在转移过程中，不仅包括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也在逐步增加着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从90年代的贸易发展状况看，资本品贸易的“逆向”增长正是资本技术密集

产业转移后的“返销”结果，日本等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不仅成为地区劳动密集产品的主要进口方，而且也在逐步增加从周边地区进口这类产品。

今后，东亚上述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以制造业相对下降、服务业相对上升为基调的产业结构调整仍将继续，而发展水平相对低一些的部分经济体也可能逐步加入这一行列，这一过程将使东亚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对地区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和流向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2. 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制度环境逐步完善

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外向型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其内部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于外向经济成分的开放度是较低的。也就是说，东亚内部市场仍是相对分割、规模较小，而且制度环境不完善，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和障碍，实际上并不能称为是“标准的国际市场”。90年代后期，东亚已在加强合作，这将逐步改变上述状态。

东亚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各经济体相互间的制度关系和经济体内部市场的制度完善，东亚市场越“标准”，它就会与国际市场越接近，市场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成为真正的国际竞争。在这种状态下，对东亚的投资与贸易就会优先重视寻求生产与消费在空间上统一的大市场，而后才是东亚已有的、与生产分离的市场。在“标准的国际市场”上，跨国公司必须拿出最新的产品参与竞争，这在非标准市场上可能就不是必需的。因为有的市场可能采取保护不让新产品进来参与竞争，也可能因此而使跨国公司不必拿新产品就可以参与竞争。例如中国的上海桑塔纳汽车因国内保护而使外国公司在较长时期内不用新产品替换，照样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在国际市场上是难以想象的。

跨国公司为参与东亚市场上的竞争，就必须降低成本，而在当地如果有较好条件将成本降在外部生产成本之下，它们自然会将生产安排在当地。在东亚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市场虽然可以不断扩大，但它们一些产业的生产成本却难以降在东亚其他国家之下，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向外转移，因此它们的市场潜力与生产能力的扩大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分割。

3. 东亚区域经济的外部约束将加强

东亚地区的制造业能力对外部经济逐渐产生了难以接受的压力，这表现在美国迫使日元升值、宣布“四小龙”从发展中经济毕业。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出口能力的快速增长，美欧的抑制也已开始，其主要表现是对中国产品提出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持续，中国对东亚地区外的国际市场开拓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如前所述，东亚作为整体，其相互间贸易已达其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但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过大，相互间贸易存在数量较大的单向贸易，部分经济体对东亚内部的贸易逆差过大，靠对区外贸易平衡，这种结构使东亚经济建立在不稳定的结构上，不仅极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还会放大这种影响，加剧自身经济受外部影响的波动幅度。这种结构在外部经济约束相对较弱的时候能够较快发展，但外部约束增强时，它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从总体看，东亚必然会加强对区内市场的开拓来克服外部的约束，这不仅将使区内贸易总额增长，而且将会随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逐步扩大它们对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调整贸易结构，缩小区内贸易的单向流动，使区域经济逐步提高其运行的自我稳定性。

4. 东亚区外战略安全结构的影响

90年代东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调整了它的对外战略结构，改变了它在冷战时期对其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利益超过经济利益的布局，将其经济利益的战略地位提高，从而迫使日本和“四小龙”作出较大的结构调整。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中对美国经济具有较大潜在影响能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这不仅在于中国作为东亚与美国之间经济循环结构的新增环节而产生的对美巨大贸易顺差，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和生产潜力将会逐步改变东亚地区的经济循环

结构，有可能使东亚经济增长机制转变为主要依靠东亚自身的市场和生产能力，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如果这种结构性调整迅速发生并完成，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将明显下降，作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将会对东亚地区事务起主导作用。从美国的角度看，这对其主导东亚事务，控制或保护它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都是不利的。如果美国得出这样的战略判断，它就有可能采取对付日本和“四小龙”的策略，迫使中国降低对美贸易顺差，以此迟滞中国的增长和影响能力的发挥。其手段可包括迫使人民币升值，或是让东亚部分经济体货币贬值；也有可能给予东盟等国家一些经济优惠条件，重新构架东亚的经济循环，将东盟再次接在“四小龙”之后直通美国市场，使中国在地区产业循环中的通道短路，以替代中国在东亚地区产业循环中的地位。这样既可压制中国，又可扶持东盟，形成针对中国的、以战略性经济结构为基础的新弧形区域性战略结构。从美国与东亚地区、特别是东盟的经济实力比较看，美国如果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以抑制中国，它在经济上的损失和战略上的利益所得是可以接受的。

（二）未来10-15年周边具有投资增长潜力的国家与地区

产业转移仍将是促进东亚地区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从美欧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看，制造业是在农业之后将会逐步相对下降的主导产业。对东亚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几个经济体都出现了制造业的相对下降，与之相随的就是都发生了对外扩大以直接投资为载体的产业转移，转移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高潮一般发生在转移的初期，而后进入对外投资的相对稳定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对外转移产业的高潮期是先后发生的。从总体看，东亚地区在今后10-15年内能够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并可扩大对外投资的经济体并不多，因而不会发生像90年代那样急剧增长的区内对外投资。

1. 韩国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对外投资较大增长的国家

韩国在90年代初期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的拐点阶段，此后它的对外直接投资从1993年的13.4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46.7亿美元，而后一直保持在40-50亿美元的规模。

不过韩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并没有像日本、香港和台湾省那样持续下降，而是在下降后又反而上升回到原有比重，即1988年最高时为31.9%，1992年为28.7%，到2000年时为31.3%。韩国制造业比重反升的原因主要有：大量利用外国证券资本进行产业升级，金融危机前引进外资的高峰时期，韩国每年引入外国证券资本140-150亿美元（1996-1997年），远远高于同期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23亿美元和28亿美元），这也同时表明韩国的自我产业升级能力要强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省；金融危机时期为摆脱危机而大力出口，导致制造业不降反升。这样就使韩国的制造业比重在日本和“四小龙”中是最高的，目前它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大约在30%左右，而日本等经济体大约在25%以下。

从经济发展与制造业相对下降的规律看，在未来10年内韩国的制造业比重应当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它将成为东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明显增长的经济体。

2. 香港和新加坡继续保持它们在地区内作为投资中转的地位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继续对其周边地区的资本流动起中转和控制作用。香港在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向外转移中，将本地大部分制造业陆续转到以广东为主的周边地区，经济中所剩制造业不足6%，因此它在今后已没有继续向外转出制造业的余力。香港的制造业外移速度过快、幅度过大，使其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变为纯服务业经济，这并不利于其经济的稳定。从90年代以来的发展看，香港经济的波动幅度很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地区——中国大陆地区经济一直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而香港则不能利用这种环境保持自己的稳定。对此，香港正积极与广东合作，以求其经济与后者有更大的融合，确保其华南地区重要的服务业中心地位，借助大陆经济的稳定性保持香港的发展和稳定。依此思路，香港仍将是该地区的金融服务中心，不会重新对其制造业大量投资。有此背

景，香港为大陆筹集外资的重要地位在未来10-15年应不会改变。

新加坡虽然也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但它与香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仍保持着较高比重的制造业。新加坡的制造业在进入相对下降阶段后，不像香港和台湾省那样持续下降，而与韩国类似，在经济发展较顺利时制造业有所下降，而在经济出现停滞或衰退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恢复，因而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又有所回升。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在对外大量输出资本时，也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保障自己的产业升级，因此它的对外直接投资要小于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新加坡今后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应是制造业继续相对下降，但其前提应是周边环境比较稳定，新加坡才能够进一步扩大其作为区域性服务中心的功能，成为区域性资本集散中心，制造业才能顺利地相对下降或向外转移。不过，从其它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新加坡的制造业已过了迅速下降的时期，今后是持续的缓慢下降，因而新加坡不会成为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国家。

3. 台湾省将进入对外投资保持阶段

台湾省在80年代后期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这一点与香港接近。在下降的过程中，台湾省同时对外扩大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使大量资本迅速外流，这显然与韩国和新加坡不同。韩国在此阶段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的同时，大量引入证券投资，新加坡是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而输出证券投资，两者的差别反映了自我产业升级的能力差距，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产业升级的要求。台湾在这阶段同时大量输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表现出一方面是自我升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投资者对其发展前景、特别是政治前景仍有较大疑虑，阻碍了投资。未来10年中台湾的政治前景若仍不明朗甚至不稳定，台湾将继续向外流出较大量资本，但如果政治较为稳定，特别是与大陆关系改善，台湾的资本外逃将减缓，制造业的相对下降程度趋缓，台湾的对外投资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不会大量增长。

4. 日本仍将是地区主要的外资来源

日本自70年代之后进入了制造业相对下降过程。日本在此过程中，投资率已明显比制造业处于较高比重时期要低。1970年时日本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5%（占GDP），80年代大致降为30%以下，而在90年代末已降到23%。由于服务业在日本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服务业总体的生产率要低于制造业，因而它对投资的吸引力要小于处于高峰时期的制造业，这就使一部分投资必然要向外寻求能获得更高生产率、更高收益的地区。受此制约，日本国内的投资率将继续保持相对低的水平，因而将继续向外输出资本。不过，今后日本制造业的下降将是逐步减缓的过程，因此它的对外投资也不会大量增长。

5. 马来西亚将在未来10年以后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的拐点

马来西亚是东盟除新加坡之外增长最快、人均GDP最高的成员。根据马政府的发展规划，它将在1990-2020年的30年间，将人均GDP翻两番。尽管90年代后期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马来西亚仍然完成了预定目标，10年内GDP平均增长7%左右。不过，由于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对美元的汇率在金融危机中大幅度贬值，因而以时值美元计算的GDP并未达到目标。如果马来西亚经济在今后能够保持较快发展，且货币逐步升值，它将在2010年之后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的拐点。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进程和潜在实力看，它有可能达到继续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能够对其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的是即将进行的领导人更替，马总理马哈蒂尔将在2003年末退休，新的领导人是否能够稳住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是影响马今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马能够顺利完成领导人的更替，并达到预定的增长目标，它将成为未来10后东亚地区对外投资迅速扩大的新来源，而届时它的首选投资目的地是周边地区，也就是它的产业转移目标是在东盟地区。

6. 中国部分沿海地区向周边的转移

中国的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京沪穗等城市地区的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如果今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以及考虑到人民币在未来升值的可能性，那么部分沿海

地区很有可能10-15年内达到制造业相对下降的拐点阶段，即人均GDP约10000美元（2010年之后）的水平，届时他们的部分制造业也会向周边地区转移。不过，它们转移的主要地区将在国内的中部地区，向周边国家转移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所述，在今后10年内，东亚地区新增的能够向外迅速扩大直接投资的地区并不多，最有可能的是韩国；在10年后，马来西亚和中国的部分沿海地区将会扩大对周边地区的投资。日本和其他“三小龙”将继续保持地区内主要投资方的地位并会有所增长，但出现90年代前半期那样大幅度扩大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不大。

（三）未来10-15年东亚能够大量吸引外资的地区

东亚地区在未来10-15年内以产业转移为背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将逐步放缓，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将逐步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将是主导地位。东亚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发展，这些工业基本以美国市场为初始阶段的主导市场，在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要求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东亚对美国的出口曾是不受限制的，因而东亚的日本以至“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基本可以不考虑外部市场的制约，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就是扩大生产能力。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全球战略发展转变，对东亚提供市场的限制逐步增加，此时东亚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转变，生产能力的扩张已不能确保经济必然的增长，外部市场的保障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此，具有增长潜力的区域内市场也就逐步受到东亚区内外投资者的重视。

1. 中国是东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

中国是东亚现阶段同时具备大市场潜力和低生产成本的惟一地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地区带来新的市场扩展空间，从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的来源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方向看，中国对外经济的迅速增长与地区产业转移有密切关系。但90年代后期大量外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使香港和台湾省的以产业转移为背景的投资份额持续下降。这些外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要目的是进占中国的市场，同时在华生产的成本也可以降得很低。从成本角度看，这是日本和“四小龙”所不具备的优势；从市场规模潜力看，又是东盟各国目前所不及的，东盟只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市场才有可能与中国相比。这样，中国同时兼备了吸引以产业转移为背景和以占领当地市场份额为目标的两大类外资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国吸引的外资数额能够急剧上升并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2. 东盟在建成自由贸易区后可具有与中国竞争外资的条件

未来10-15年，东盟仍将是东亚地区居中国之后的具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优势的地区。

在总规模方面，东盟在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其整体市场规模将继续在日本和中国之后位居东亚第三位。

在劳动成本方面，东盟目前人均GDP约1400美元，中国人均GDP约1000美元，东盟将在10年内被中国追上，大致在人均1600美元左右（2002年价格）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在劳动力成本上对东盟的优势将逐步消失，这将有利于东盟与中国竞争外国资本。但与中国相比，东盟的弱点在于它很难实现内部劳动力的完全流动，这样它与中国在吸引外资的竞争中仍无明显优势。

3. “四小龙”逐步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下降

东亚的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中国、日本、东盟相比，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而且收入水平较高，因而在吸引外资方面既不具有市场规模优势，也不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因此在东亚制造业部门对外资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他们自己也进入了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自己的制造业也要向外寻找新的投资地区。因而从制造业的角度看，今后它们基本上将是向外输出资本的来源地。

在服务业吸引外资方面，这些经济体应有相对优势，作为区域性的金融、贸易、研发、物流等方面的中心，“四小龙”比中国和东盟国家更具各自的优势。但是，区域服务业中心要求其经济与其服务对象区域的经济有较为紧密地结合，否则其服务业仅为自己的经济服务，它的市场前景仍然受到很大约束。而此点正是当前东亚“四小龙”经济转型所急需解决的关键。“四小龙”中目前只有新加坡与周边地区有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框架，其它三个经济体与周边都没有正式的经济合作机制，因而它们在其外向型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同时，却不能建立起相应稳定的外向型服务业，这对他们的服务业吸引外资十分不利。

新加坡依托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其服务业吸引外资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而中国周边的香港、台湾省以至韩国在这方面就没有可以借助的机制。香港与澳门和广东省寻求更紧密的合作方式，显然已在迫切地寻求解决的方式。韩国的制造业向外转移尚处初期阶段，对此尚不十分迫切。只有台湾省，制造业向外转移已进高潮，而囿于政治原因又不愿与大陆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因此不仅其资本外流是难以控制的，而且它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在其政治环境不稳定、前景不明朗的条件下，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就会更加困难。

（四）未来周边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影响我国周边地区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产业转移和区内增长潜力较大的市场增长，这两大因素的作用都将因中国的加入发生变化，但未来10-15年内，中国的影响尚不足已完全改变周边已有的贸易结构。

1. 产业转移链形成的贸易联系仍将是东亚贸易结构的基础

一方面，东亚产业链形成的贸易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国不会在10-15年内向外大规模转移产业以形成地区新的产业链环。东亚区内贸易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内产业链的延伸、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所致，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工业化阶段中所需经历的基本过程^[4]在区域范围内的体现，它表明东亚地区多数经济体自身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需要区域经济结构补充平衡，才能正常运行，这也就是东亚外向型经济的结构性基础。90年代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后，对区域结构变化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下一轮的转移将会延迟。因为东亚产业转移的最重要原因是劳动成本的提升导致竞争力的下降，而中国巨大的低成本人力资源足以支持10-15年，在此期间中国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的可能性不大。况且，从目前周边地区的经济力量对比看，尚无具有足够规模的经济体能够接续中国转移出来的巨大产业。因而中国一旦需要转移，转移的机制、方向、方式等等都应发生重大变化，才能保证转移的顺利进行。否则，即便发生转移，也不会使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同步，或者说是转移不会导致前期东亚所取得的群体性高增长成绩。显然，这种区域性的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不会有大的改变的，因此它将继续决定地区贸易结构的基本走向。

另一方面，中国从周边地区的进口虽然增长很快，但其中约有一半是加工贸易促成，它的产业背景实际上是地区的产业转移。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要受区外市场对这些产品吸收能力的制约，因而加工贸易的生产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实际上仍然是区外市场的能力，它并不是中国最终所能左右的。

不过，由于未来10-15年能够进一步扩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周边经济体只有韩国，因而这种产业转移链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将会有所下降。以当地市场为目标的投资逐步扩大，以及区域内贸易合作的开展，将开始转变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但它并不足以消除转移链对贸易的影响，实际上它会与已有的贸易结构相结合。

2. 东亚区内贸易圈之间相互关系重新构造

东亚区内贸易中已形成的三大贸易圈之间，日韩与中港台、日韩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紧密，而中港台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较弱。在未来10-15年期间，从贸易额的分布看，上述三边关系基本不变，但是基本的商品流向将发生较明显的变化，形成三边都存在不

均衡的循环关系。

首先，日本继续扩大对华贸易。目前中国已超过韩国而成为日本在东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日本制造业的继续向外转移，日本相应要增加转移产品的返销。由于日本向外转移的制造业大部分以“四小龙”作为中转，而后者中的香港、台湾省以至韩国都逐步将各自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定在中国大陆，因此日本的返销产品来源也将越来越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实际上，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已是日本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部分，虽然它已成为中日之间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但实际上目前日本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就足以弥合对华贸易逆差，而日本对台湾省和韩国的大量顺差中有很大部分应是从中国大陆而来，因为台湾省和韩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从发展趋势看，台湾省已进入香港目前在中日之间的贸易角色，韩国将逐步加入这一行列，因而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但这应是日本所能承受的。日本的持续产业转移、扩大从区内的进口将使其对东亚贸易的顺差逐步下降，以至达到基本平衡的状态。

其次，日本将继续保持并扩大对东盟的贸易顺差。80年代末，东盟经济迅速发展时，大量进口日本的资本品以支持自己的产业升级，金融危机前日本对东盟贸易顺差达到顶峰，危机爆发后东盟进口能力下降，日本对东盟贸易顺差相应下降。今后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东盟经济逐步恢复增长，东盟进口能力也将恢复，这将使日本对东盟贸易顺差将再次扩大。

第三，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中国将增加对东盟的资源类产品需求，同时作为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对东盟其他产品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不过，东盟的非资源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面临其它工业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虽然有即将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优惠通道，但东盟产品的竞争力仍嫌不足。

实际上，目前这种三边关系已出现，而未来区域贸易结构中最大的变化应是韩国逐步脱离原有的日韩贸易圈，成为非常明显的日中贸易的中介，这一发展过程将与台湾省在90年代的发展近似。90年代初，台湾开始扩大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当时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韩贸易圈，也就是说当时应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省贸易圈。但是在90年代台湾省逐步扩大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出口，同时大量从日本（也包括美国）进口，台湾省就逐步演变成越来越向中国大陆地区靠近的贸易中转地区。如果台湾省进一步消除对大陆产品的种种限制，台湾省贸易将更加与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融合。2000年以来，韩国也逐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甚至超过了对日本的出口，同时进口的主要来源仍是日本，因而日本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与台湾省10年前的状况十分相似。随着韩国制造业在今后10年内的继续向以中国为主要目的地的转移，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继续扩大。韩国因此也将逐步游离出日韩贸易圈。

四、我国的对策

从上述对我国周边地区贸易投资结构的分析看，目前东亚正在从以产业转移向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转换的时期，而我国在这一转换时期中所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既可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竞争转移产业的优势、又可利用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的优势。也就是说，我国在未来10-15年将处于东亚发展的结合部位，不仅对我今后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而且对我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亦十分有利。因此我应尽力保持并延长此地位，相应的基本对策思路一是延长我在产业转移中的接收地位，延缓向外转移，同时加快发展经济；二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制度关系建设，一方面防止区域经济结构过快转变，另一方面为我国进入向外转移期营造一个较好的制度环境。

（一）延迟我国沿海地区的向外转移期

1. 将劳动力流动制度化、规范化，以延长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成本逐步上升，竞争力相对下降，将在今后10-15年逐步进入向外转移时期，一些沿海大城市将可能提前进入这一时期。应利用我国市场统一，要素流动较通畅的优势，在城市周边地区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卫星城镇，吸收其它地区低成本劳动力流入，保持这些地区有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与低成本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建立劳动力轮换制，减低沿海地区人口急剧增长与积淀形成的社会成本与压力。

2. 同期加强中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做好接收沿海转移产业的准备

中部地区是接受沿海地区转移产业的首选地区，目前在开放的意识、政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多方面与沿海尚有明显差距，特别是所谓软环境方面的差距更需改进。以地方保护主义为首的一些错误意识仍十分严重，实际上并没有把当地市场视为国际市场。应对沿海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给予“国际待遇”，这是在中西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以市场优势替代优惠政策

加入WTO使我国市场更加国际化，将迫使外资企业提高技术含量，以先进的产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我国国内企业在WTO过渡期内迅速提高竞争力，迎接其后的大量外国商品的直接竞争。应当说，届时国内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都要作为同等的“国内企业”与外国商品竞争，那时才是“真正的较量开始”，对此，日本的跨国公司已制定相应战略准备参与竞争[5]。进一步开放市场将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潜力，这对外资的吸引力要大于一般的优惠措施。目前，过多地给外资企业优惠措施，既对吸引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没有太大的作用，又提高了引进外资的成本，特别是将对国内企业参与国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提供十分不利的环境。

（三）在保持东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缓解对日美贸易顺差

未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自香港、日本和美国，实际上香港只是转口，因而最终来自日美；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台湾省、韩国和东盟。这是东亚地区产业与贸易投资结构所决定的。中国对日美贸易顺差将一直是贸易摩擦的引发点。在目前的区域经济关系结构中，不可能完全消除中国对日美的贸易顺差，只能将其逐步缓解。况且，这种区域经济结构对东亚整体发展有利，如果将其破坏，则将使东亚整体结构突然改变，很可能使各方都受到损失。可能采取的缓解措施一是迫使台湾对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二是美国放宽中国从美进口产品的限制。

（四）妥善处理对台湾省、以至韩国的产业转移程度

香港、台湾省和韩国的对外产业转移都受到了周边地区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它们的转移并不完全是经济过程。香港的转移是其正是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谈判时期，当时政治前景不甚明朗，使大量香港企业外迁，导致香港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此后香港经济缺乏自己的制造业，在区域性的经济波动中十分不稳定，这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台湾省目前向中国大陆地区的产业转移正在高潮，而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同样不明朗，关键在于它与大陆地区的政治关系没有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量企业外迁，因而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如果台湾省制造业今后出现类似香港的外移趋势，台湾省经济同样会陷入不稳定、而且受大陆地区左右的局面。这就可能引起美国等外部势力的经济干

预，形成对我不利的周边经济环境。

韩国在未来将可能向我国大量转移产业，可能也会出现同样问题，在政治环境不确定的前提下，过度向外转移，造成经济不稳定而引发区域性的政治以至安全问题。

对此，应立即着手研究区域产业转移的限度、阶段、方向及其与政治安全环境的互动影响，基本原则是保持区域的稳定和持续的共同发展，减少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

（五）加快建设区域经济制度体系，保持与东盟关系，不使之心理上被“边缘化”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完成后，中国市场将更加对东盟开放。应借此扩大对东盟的影响。从前述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中国对东盟贸易将呈现持续的逆差，既如此，应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主动示利于东盟，并将其与自由贸易区的进展结合起来。表明中国的崛起对东盟的利益已制度化，减轻东盟的疑虑。

东盟十分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时期在区域事务中被“边缘化”，实际上东盟对中国的竞争实力仍然很强，特别是在东亚区域内的产业转移中，东盟一直具有替代中国地位的潜力与可能。如果美国要干预东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使东盟替代中国构成新的产业转移链，虽然对东亚整体经济利益来说要劣于现有的向中国转移的路径，但其产生的不利之处主要由中国和美国承受，对东亚参与转变结构的地区来说，利益变化不大或者利益明显增长，东盟可能是其中受益最大者。

因此，对东盟与上述对台湾省和韩国类似，都必须使其得到或感到未来的东亚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对它们的发展是有利的。这在今后的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尤应注意。

[1]此处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香港特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10个经济体。

[2]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年报及月报；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有关年版；台湾省“中央银行”：《金融统计月报》（IMF格式）。

[3]王晓龙：“关于投资鼓励措施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的探讨”，《中国外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主办，2003年第3期。

[4]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第21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阐述了从钱纳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工业化过程中产出结构变化的深层意义是，“农业比重下降主要来自最终需求的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的上升主要源于中间需求的扩展，……”。

[5]蔡林海：“2005’真正的较量开始——日本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调整”，《中国外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第3期。